

徐宝余 著

庾信研究

学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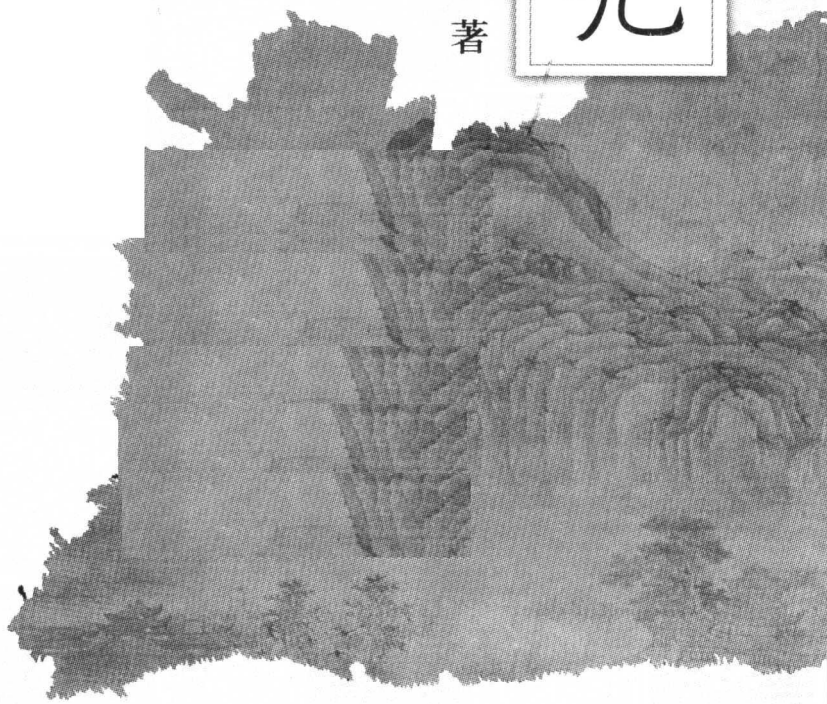
国家文科基地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学科点项目

庾信研究

徐宝余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庾信研究/徐宝余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3.12

ISBN 7-80668-619-3

I. 庾... II. 徐... III. 庾信(513~581)—人物
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5564 号



庾信研究

作 者——徐宝余

责任编辑——李晓梅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 张——7.875

字 数——17.4 万

版 次——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000 册

书 号——ISBN 7-80668-620-7/I·180

定 价——16.00 元

序

袁行霈

对庾信的研究历来偏重于文学方面,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一些,就可以看到他不仅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对汉族文化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起了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我长期以来一直希望能以文史互证的方法,把庾信放到南北文化交流以及南北朝文学向隋唐文学演讲这两个坐标的交汇点上,对他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是始终未能付诸实践。现在,这个愿望终于由徐宝余博士完满地实现了,我的欣慰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回想当初宝余来北大参加博士生入学考试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信他是一位读书人,具有学术的潜力,就录取了他。入学以后我们有了更多的接触,我发现他聪明勤奋,

待人厚道。在确定了以庾信为对象撰写学位论文时,他应我的要求写了一篇《桃花赋》,我对他的才情和能力有了更充分的信心。我一向认为研究古代文学既要掌握大量的资料并能够对资料进行甄别辨析,又离不开研究者自身的才情以及对文学作品的体悟。宝余在这两方面都有值得称道之处,所以他的论文能够写成这样的规模并多有创获。

宝余的论文中精彩的考证和论述不少,如关于南北朝文化交流渠道的考索和论述,解决了一个十分重要但长期被忽略的问题。关于庾信在南北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贡献的论述,翔实可信。关于庾信入北之后,所具有的“使者情结”、“归隐心理”、“乡关之思”和“史家意识”的分析,令人认服。关于庾信的风格以及他对前代文学的继承和对隋唐文学的影响,论文着墨较多,描述也很细致,特别是关于庾信悲苦之辞与“楚辞—李陵系列”的关系、咏怀之作与“小雅—阮籍系列”的关系、菊酒意象与陶渊明的关系,都有独到的见解。此外,关于庾信作品的结集过程及其文集版本的考辨,则显示了作者在目录学和版本学方面的动力。

宝余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有幸到上海师范大学任教,得到各位老师的帮助,特别是得到孙逊教授的关心和指教,今后必将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取得更迅速的进步。我相信以他的诚实、智慧和勤奋,一定会继续作出新的更重要的成绩。我在北大任教已经四十六年了,一向以学生的成就为自己的光荣,并希望学生超过自己。我的希望会在宝余身上实现的。

2003年11月21日

绪 论

庾信是六朝文学的集大成者,他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发展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近几十年来,庾信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相对来说重大突破性的论文较少,而重复研究的现象较为严重。所谓重复研究是指研究者的眼光总是停留在固有的一些问题上停滞不前,而缺少新视角和新方法。所以,本文在进行相关研究之前,对于研究中所出现的问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作一个鸟瞰式的回顾,以示本书的立意所在。

庾信研究成就之一,就是澄清了庾信的家世和仕历。《哀江南赋》云:“稊嵩、华之玉石,润河洛之波澜;居负洛而重世,邑临河而宴安。”宇文逌《庾开府集序》云:“若夫有周之时,掌

庾原其得姓；皇晋之代，太尉阐其宗谱。”从而将庾信的远祖与庾亮联系了起来。古代文人述祖称著不称微，这是较为通常的现象。更何况清代倪璠注释逋《序》时就说：“是太尉亮乃信远祖之族，非其本族也。以其晋世椒房氏族极盛，故称引之。”庾亮为庾信的远族，这本没有什么争论之处，但是由于近年来研究者的误解，认为庾信虽籍出南阳新野，但其祖先却源于颍川。故关于庾信的家世便有了林怡《风流世家子》（《庾信研究》第一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5月）等文的提出，认为南阳新野庾氏（庾信族籍）与颍川鄢陵庾氏（庾亮族籍）有别，并无宗族关系。可以说，这一事实目前已经得到澄清。关于庾信的仕历，取得明显成就的当属鲁同群先生。他的《庾信入北仕历及其主要作品的写作年代》（《文史》第19辑，中华书局1983年8月）一文及专著《庾信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对于入北之后主要仕历作了较为详尽的考证。此外林怡《庾信研究》一书中《庾信在梁仕历考》章，对庾信在南朝的仕历也有较为细致的考辨。尤其是鲁文，材料详实，论辩严谨，后来研究者的立论几乎都是基于鲁文的考订之上，或是基本上没有冲出鲁文的考订范畴。

庾信研究成就之二，就是对于庾信诗文的考定。在诗文考订方面，鲁同群《庾信入北仕历及其主要作品的写作年代》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此外凌迅对《拟咏怀诗》（《读庾信的〈拟咏怀诗〉》，《文史哲》1982年第2期；《庾信〈拟咏怀诗〉当别作编次：〈拟咏怀诗〉再思考》，《文苑纵横谈》，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王仲镛对《哀江南赋》（《〈哀江南赋〉著作年代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4期；《再谈〈哀江南赋〉的著作年代》，《中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3期）、刘文忠（《庾信

前期作品考辨》，《文史》第27辑，中华书局1986年12月）对庾信前期诗歌的考订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哀江南赋》作年的考订上，清人倪璠认为在周武帝天和年间即公元566到572年；陈寅恪根据“岁星再周”推断作于周武帝宣政元年即公元578年；而鲁同群则认为作于557年陈受梁禅以后，并且认为此赋的主旨并非要表达什么“乡关之思”，而是为了向北周朝廷求官，以改变自己“从官非官，归田不田”的窘困处境；王仲镛根据颜之推《观我生赋》、魏收《为东魏檄梁文》、《哀江南赋》三文出现的时间先后顺序考证出倪璠“周武帝天和年间说”更为可靠，其时庾信五十多岁；林怡在《庾信研究·世乱垂心志》及《庾信〈哀江南赋〉创作时间新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当作于566年，因为此年距庾信入北之年正好是12年，符合“天道周星”说法，同时也正好是庾信服母丧的时期。鲁、王、林三人对于《哀江南赋》虽然各自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对于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系年作出了质疑，提出《哀》赋并非作于晚年的观点。

庾信研究成就之三，就是对于文风的研究。有部分研究者注意到了庾信早期的作品，如李艺荣《庾信前期诗歌漫议》认为不应该对庾信前期的作品作一概的否定，庾信前期也有一些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都较好的作品。大多数的研究者则把目光集中在庾信晚期的作品上，如周文璜《穷缘情之绮靡：试论庾信后期诗赋的抒情特色》（《中州学刊》1988年第5期）、吴先宁《北方文风和庾信后期创作》（《厦门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陈信凌《庾信后期诗赋的美学风貌》（《江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叶树发、杜华平《庾子山诗风格

论》(《江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11期)、樊运宽《论庾信后期骈文的特色》(《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习毅《庾信晚期文风之变》(《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等等,他们或是认为庾信入北后诗风发生转变,由南朝的华艳绮靡转为凌云健笔,或是认为庾信后期并没有完全丢弃绮艳,相反地而是藏骨于艳、纳绮于质,或是着重探讨庾信诗风转变的外在因素和内在机制。对于庾信诗赋整体艺术技巧和成就作出研究的主要有以下几篇:葛晓音《庾信的创作艺术》(《中州学刊》1982年第4期),祝凤梧《庾信的诗赋特色》(《中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4期),王则远《庾信诗歌表现艺术新探》(《学术论坛》1993年第4期),叶树发、杜华平《庾子山诗风格论》(《江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11期)等等。《庾子山诗风格论》则是对庾信诗歌风格论述得比较成熟的一篇,文章认为绮艳是庾信诗风的底色,而对唐诗的影响主要的是杜甫所归纳的清新和苍凉,庾信在绮艳之风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两个具有倾向性的特点,实际上预示了唐诗的发展方向。

庾信研究成就之四,就是关于庾信地位的问题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张锦池《论庾信在南北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及其对唐诗的影响》(《文艺论丛》第20期,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刘思刚、刘长春《庾信:南北民族文化融合中的“文化特使”》(《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对于庾信在南北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作了描述。庾信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大家都注意他和杜甫的关系。日本的加藤国安《论杜甫的创作与庾信的关系》(《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从具体的作品出发探讨庾信对杜诗的影响;吴相洲《庾信杜甫老成境界之比较》(《内蒙古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和杜晓勤《庾信、

杜甫诗歌集大成之比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则从老成之境、集大成这一方面对庾信和杜甫加以比较。此外,鲁同群先生所撰《庾信传论》、曹道衡、沈玉成二先生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中有关章节,则从大的文学史发展方向充分肯定了庾信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庾信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过度阐释”,这在庾信思想研究方面暴露得较为严重。从文学作品出发来探讨作者的思想应该有一个限度,不能作毫无意义的再度生发。只有当作品中流露出的思想是作者的真实表达,这样的研究才有确实的可行性。又如“乡关之思”,研究者过多地注重这一心理价值高低的评判,以至于在一些难以说清的问题上发生了纠缠,而对于这一心理所产生的背景以及“乡关之思”提出的历史背景缺少关注。又如在庾信文风的研究方面,研究者注意到了南北文风的不同,但是对于庾信作品的南北作年问题缺少细致可信的辨析,所以在论述上往往没有足够的论据。

本书在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在避开前人研究误区之后,努力作出一些探索性的尝试。其论证的严谨性以及结论的可靠性,还有待方家指正。以下是本书的主体设想:

一、人物研究应该走年谱先行的路子,作品研究应该走系年先行的路子。然而由于近些年来缺少这方面的细致工作,论述往往缺少时间上的论据,从而使结论显得模糊不清,甚至是前后颠倒,有的虽也做了系年的工作,但是在系年的标准上缺乏严谨性,有时又逾越了“系年从宽”的一般性规范,从而带来了不必要的繁琐论证。本书在人物年谱和作品系年上

基本参照了倪璠和鲁同群先生所编制的年谱,并对其作了必要的修正。由于这项工作整体突破性不大,所以不再单独列出章节,而是将之放到相关的论述及注释中。

二、本书是基于两个支点之上展开论述的:一是将庾信放在南北文化交流的交叉点上加以考察,一是将庾信放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向隋唐文学演进的交叉点上加以考察。从而为庾信的整体研究奠定了基本框架。又,虽然本书是着眼于对庾信作整体性研究,但是在不破坏基本研究框架的情况下,对于目前研究中已经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便不再赘述,并于每章第一条注释中加以适当说明。

以下是本书的主要结论:

一、本书将庾信放在南北朝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上加以考察,认为南北朝时期文化交流呈现出多形式、多层次的结构。庾信等人的入北,加速了这一交流的进程。特别是在文学创作和制礼作乐方面。而庾信的“艳而有骨”、清新刚健的文风正预示了隋唐文学发展的新道路。

二、庾信入北之后的心态十分复杂,本书提出“归隐心理”、“使者情结”、“史家意识”和“乡关之思”四个方面,对之加以较为细致的辨析。并根据归隐心理的发展变化将庾信入北之后的心理脉络分为四个阶段,以揭示它们的内在联系和形成原因。从而得出庾信入北之后由对抗到无奈到相融这样的心理轨迹。这样,对于乡关之思所具有的思想内涵和外延便有了较为可信的分析结论。

三、庾信作品的结集过程在清代以前主要有两次,一是滕王宇文逌所编二十卷本,一是明人所编各本。《隋志》中所说的二十一卷本,就是滕王宇文逌本,由于计算卷数时加上了

目录一卷,所以才成为二十一卷。后代公私书录中所云二十一卷本其实是不存在的。

四、对于庾信文风转变的论述是基于对他南北作品分期的前提下所形成的。认为庾信在南朝时期的作品风格也是多样的,并不能一概称之为绮艳。而庾信入北之后,作品所呈现出的风格也是多样化的,绮艳作品仍然存在,并且主要分布于与北朝诸人的和诗和女性题材的作品中;清新刚健的文风则主要分布于写景体物和咏怀作品中,并且其艳丽的底色没有尽褪。

五、对于庾信作品的整体艺术特色,主要从体物抒情的结构、文体之间的互渗特征以及使事用典三个方面作出探索,从而揭示出庾信创作结构上的巧妙性、文体之间的互渗性和使事用典的灵活性等特征。为寻找和总结庾信诗文技艺提供了三个较为可行的角度。

六、关于前世作家对于庾信的影响和庾信对于后世作家的影响,本书也作出了较为认真的梳理。基本上是在遵循三个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操作的:(1)作家经历或文风大致相同;(2)清代以前已有研究者指出它们之间的因承关系,经重新检验比较可信;(3)他们的作品有着明显的语句或立意上的承袭。从而论证了庾信的悲情文学创作来源于“楚辞系列”,咏怀作品与阮籍的关系,隐逸菊酒之作与陶渊明的关系,并对隋唐人眼中的庾信以及庾信对隋唐作家的影响作出了描述,从而揭示出作为六朝文学集大成的庾信在魏晋至隋唐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第一章 庾信与南北朝文化交流的进程	1
--------------------------------	----------

第一节 南北朝文化交流的形式与范围	1
--------------------------------	----------

南北文化交流的形式:书籍的流通,使者的往来,僧道的播迁,人员的降附,户口的流动,边境互市与南北馈遗/文化交流的范围:文学,经学,史学,书学,礼乐制度,官城制度,官制,舆服,天文,历法,宗教/南北文化交流的特点:多形式,多渠道,多层面

第二节 南北朝文化交流中的庾信	35
------------------------------	-----------

南朝文化的代表:宫廷生活与家族背景/文化使节的作用:预麟趾殿校书,制定六代乐,创作大量墓志碑

铭,孝义与政干,“庾信体”的深广影响

第二章 庾信的人格与心态 50

第一节 侍臣与诗人的双重品格 51

南朝志满意得的侍臣生活/北朝侍臣身份与要求独立品性的诗人身份之间的分离/双重品格所带来的诗文创作上的差异/双重品格所带来的后代人物评价上的差异

第二节 庾信的使者情结 56

诗文中众多的使者形象/一生三次出使的时间和任务/出使西魏:交涉疆界与畏谗远祸/心理错认:使魏存梁

第三节 庾信的归隐心理 78

归隐心理的四个阶段/产生原因:长期学养和北方的特定处境/长期学养:家族传统和学识/北方的特定处境:文化冲突,华夷之辨,北人重视实际才能,贫乏的物质生活,入北之后的家庭遭遇/出仕的原因:物质上的贫困,施展抱负的渴望,报恩的思想

第四节 庾信的乡关之思 100

褒与贬两种评价/乡关之思的内涵:故国兴亡的反思,羁旅状态的体认,贰臣身份的自惭与自责/乡关之思的对象:全盛时期梁代/乡关之思的情感是真实的/乡关之思不同评价的形成原因:不同的历史形态;庾信内在思想的矛盾性和乡关之思对象表达的模糊性;“论心而略迹”和“据事而废言”

第五节 庾信的史家意识 109

史家意识的三次明确表达/入北早期,撰史的思想基

础是《左传》的影响和对士人气节的追求;撰史的直接起因是萧韶《太清纪》;史家意识在作品中体现为“悲身世”与“念王室”/入北后期,“留滞终南下,惟当一史臣”是庾信向北周政府所作的一种亲合姿态/史家意识与南北朝时期私家撰史风气的关系/史家意识与历史著作的形成/史家意识对文学创作影响:以史笔入诗文

第三章 庾信风格的演变及其创作特色 132

第一节 庾信作品的结集过程 133

倪璠的解释/《隋志》等书所载多出一卷乃是目录/明人辑本的五个来源:庾信六十七岁之后的作品,隋文帝平陈时所得逸文,保存在总集中的南朝之作,流传于东魏及北齐的南朝之作,唐宋时期类书/今天所见庾集并非按时间先后编排

第二节 入北前后诗风的变化 140

庾信作品的南北分期/早期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入北之后南朝风格的延续:绮艳和清新/入北之后南朝风格的演变:以艳语写悲情,比兴寄托,“凌云健笔”的“老成”风貌/风格变化的深层原因:情感的巨大变化,以北方景物入诗,语句意义指向的多向性

第三节 体物抒情的巧构性 155

登高诗和咏舞诗/体物的巧构性:运用差异对比,注意物候变化,真幻相生/抒情的回环性:语句的回环性,情感的回环性/情景结构的多样性:结句抒情,通篇直写,情景交融

第四节 诗赋之间的互渗 167

诗赋早期形态之关系/赋的诗化原因:诗赋作者身份的双重性,大赋创作对时间的特殊需求,时代对简洁文体的呼求,书籍不便流通/诗赋化原因:体物细致入微的需求,幽隐情感抒发的需求/南北朝诗赋互渗的普遍现象/庾信作品诗赋互渗程度显著提高/庾信的诗赋互渗与唐代歌行

第五节 使事无迹…………… 175

“使事无迹”的提出/用典溯源/齐梁文坛对大量用典的两派意见/使事用典风气形成之原因:诗赋互渗,经学的衰落,史学的兴盛,礼制的变迁,类书的编撰,帝王的提倡/齐梁间使事用典的两股潮流:“竞须新事”与“事出于沈思”/庾信用典的技巧:一典多用,多典并用,多典揉用,曲用典故,典故的具象化/庾信用典评论的两点辨析:钱钟书“左支右绌”说与陈寅恪“今典”说

第四章 承前启后的作用…………… 190

第一节 庾信对前代文学的继承…………… 190

悲苦之辞与“楚辞—李陵系列”之关系/咏怀之作与“小雅—阮籍系列”之关系/菊、酒意象与陶渊明之关系

第二节 隋唐作家对庾信接受…………… 204

隋文帝改革文风与隋人对于庾信接受/唐初君臣在理论和创作上对于庾信的双重态度/诗文革新运动中的庾信:从初唐四杰到陈子昂/李、杜对于庾信创作的汲取和再认识/李贺、李商隐之作与庾信之关系

主要参考文献	223
后记	232